

营改增继续：小企业望减税过千亿

民建中央的一份提案认为,5个主要税种改革不到位,真正意义上的减税,应以货物和劳务税和所得税的5个主要税种的减免为主,即放弃政府的部分收入、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 本报记者 张龙

为企业减税,再一次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的热点,不少代表和委员均对此提出议案和提案。

民建中央在其提案中指出:当前小企业需要缴纳十多种税项,面向中小企业的行政收费项目多达69个大类,企业为职工支付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高达40%以上。

调研中,一些小企业反映,如果把各种隐性、显性的税费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在经营成本的40%以上。小微企业的税费负担沉重,利润空间被极大地挤压,大量小微企业处于亏损运营状态,甚至脱离实体经济,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的潜在经济风险,已经成为阻碍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

3%到5%：危险的利润率

北京的陈平坚高呼“交的税要是能降低一半就好了”。陈平坚同时经营着一家小型贸易公司、一家IT公司以及一家太阳能发电设备公司。

“目前我们要缴纳的增值税的税率是17%,如果能降一半,企业就可以有资金扩大规模,目前只能在微利的边缘上徘徊。尤其是贸易公司,利润率非常低。”陈平坚说。

以陈平坚的贸易公司,在规模上属于小微企业,1年的销售额为500多万元。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这个公司经营着一些在去年看来是冷门的产品,加上有人扶持,去年的纯利润有近50万元,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

而陈平坚的同行,一年的利润率只有3%至5%,税负负担要占其利润的至少20%以上。“这还是保守的说。”陈平坚说,“这还不算要缴纳的一些费用。”

对这些小微贸易公司来说,17%的增值税成为了最大的缴税负担。

对于新兴产业太阳能发电设备来说,陈平坚也并未觉得乐观。“太阳能发电设备这种公司研发和销售是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中国税收政策报告2012:税收与消费》。报告称,近期是加大力度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最佳时机。

分开的,销售也是按照17%的增值税来算,加上太阳能行业并不景气,很难维持。”

陈平坚比同行幸运得多,他的设备受到了科技部的赏识,安排他与一家大企业做了对接,这才让他的这家公司起死回生,但他的同行们没有这么幸运。“90%的同行都死掉了。”陈平坚说。

浙江一家集成电路制造企业负责人说,该公司生产包括芯片设计、加工、测试、封装四个环节,如果同一企业完成四个环节,产生100万元的销售额,按17%税率缴增值税的税额为17万元。但假如该企业将芯片设计、测试环节外包,这两个环节产生的营业额为40万元,那么外包的公司需要缴纳2万元营业税,但这2万元的税收无法给原先生产企业进行抵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将上述两个生产环节外包的话,整个生产环节产生19万元的税费。”

在民建中央的另一份提案认为。目前,5个主要税种的改革不到位,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货物和劳务税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海关代征进口税等构成,所得税主要由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构成。除海关代征进口税外的5个税种收入占比过大,以2011年为例,全国税收总收

入中,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为75.3%。真正意义上的减税,应以货物和劳务税和所得税的5个主要税种的减免为主,即放弃政府的部分收入、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财税收入增长或降至个位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中国税收政策报告2012:税收与消费》。报告称,近期是加大力度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最佳时机。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未来财政和税收收入增速将下降,或会呈个位数增长。

报告认为,从财政承受能力来看,近年来财政实力大大增强,对结构性减税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从《福布斯》杂志发布我国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以来,社会公众对税负负担的关注度不断提高。报告认为,尽管社会公众的福利性要求越来越高,财政支出压力也在加大,但税收方面可收到“退一进二”的效果,即当前结构性减税,将来可带来更多的税源和形成更宽的税基,税收增长反而更快。因此,当前实施更大力度的结构性减税是一个最佳的时机。

随着结构性减税的进一步深化,

“营改增”已经成为减税的重点突破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只有增值税,才最适宜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营改增”是当前中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全国工商联在其提案中指出,应当适当扩大营改增试点行业范围,增加可抵扣项目;完善现有政策执行中的“便利性”和“反馈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营改增”试点一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制度设计也更加完善,已经具备进一步扩大试点的条件。“营改增”今年将继续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事项来开展,去年上海实施“营改增”后减税规模达到260亿元,今年如果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可以达到千亿级的减税规模,如果顺利的话,“十二五”期间可以推广至全国。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对小微企业大规模减税、减费、减负,对小微企业的减税要从百亿级上升到千亿级,严防小微企业税负反弹。

陈平坚告诉记者,如果减税政策切实可行的话,将多招聘一些人,把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扩大企业规模。

产能：越调控越严重，根在财税体制

■ 本报记者 陈玮英

10年前,抑制产能过剩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10年后,在调控过剩产能的背景下,让人感到莫名的是,“越调控反而越多”,尤其是2009年以后,很多限产行业的产量骤然被放大。

产能过剩已成当前中国经济最大挑战。“之所以出现产能过剩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粗放的增长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

“这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做应做的事,充分相信企业在市场中的判断。”一位研究国内去产能化的专家如是说。

利益诱惑大于现性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电解铝产能从2003年的554多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1250万吨。就在2009年政府宣布不再核准新建、改扩建电解铝项目后,当年电解铝产能增长幅度为25%以上。2010年年底产能达到2300万吨,2011年产能超过2500万吨。

“几年以前,国家就说过不再审批新项目,但这几年电解铝产能在成倍增长,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项目是经过审批的。”一位民营电解铝企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而这些没有‘准生证’的项目对

“淘汰落后产能10年调控却越调越多。根源在于目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要对地方政府进行GDP考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打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和地方关系不顺,调控的结果无法达到预期。

当地的GDP都是有贡献的。”上述专家指出。

“当地政府要上新项目,给出了优惠条件,我们没理由不做。”上述电解铝企业人士话锋一转,“而且我们不做,也会有其他企业来投资做,那我当然要做,否则就给自己增加了竞争对手。”

据安迅思统计,2012年,全国PPC

(聚碳酸亚丙酯)产能超过2000万吨,但实际有效产能不到1400万吨。

可想而知闲置的产能有多大。安迅思化工信息总监戚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还会不断有新项目,是因为随着市场增长趋于平缓,供应的增长还在持续增加,而产品的利润在下降,使得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为了存活和获取利润,只有通过规模化生产,才能降低其平均成本。

剑指财税体制

2009年9月,国务院曾正式下发《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就在2009年秋季,河南一家钢铁厂扩建。而在上述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再核准和支持单纯新建、扩建产能的钢铁项目。

据媒体报道,这家钢铁厂的征地手续直到2012年才最后办完,分11次报批,“项目最终占地达到112公顷”,每次征地的面积,都控制在省级批准权限内。

一位中钢协人士曾感慨,地方政府在钢铁行业发展中的推手力量很强。“在广东,省里支持广东钢铁集团。到了韶关市,就支持韶钢集团。到了区县就支持底下的小厂。”

“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推向地方政府。”上述专家表示,因为目前的体制,

中央要对地方政府进行GDP的考量。而且地方财政主要来源财税,如果没有企业投资,地方财政支撑起来比较困难。

“地方政府需要解决就业等问题,需要上项目,这就造成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出现重复建设。”上述专家指出。

央地政策左右互搏

农行研报指出,2012年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2013年,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势头依然强劲。

据戚敏介绍,华东地区的PPC生产厂家已经开始到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等地建厂生产,“那里有资源优势,成本低。”

“虽然当地也在淘汰一些产能在一两万吨的生产厂,但新上项目的产能则要远远高于淘汰产能,可能在三五十万吨。”戚敏表示。

“中部、后发展地区以及不发达地区要上项目,需要利用资源优势来上项目,即使中央规定不能上的项目地方也会想办法上。”上述专家直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在上述专家看来,这也就是地方政府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也是根本的问题,“中央和地方关系不顺,调控的结果可能无法达到预期。”

声音

请给民办教育税负松绑

■ 本报记者 许意强

“虽说我国法律规定,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都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但却很难取得同等地位、同等待遇,民办教育的处境一直都是比较尴尬和艰难,与公办教育不可同日而语。”日前,广东最大的民办教育机构——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发出呼吁,应保持学校办学的自主权,不能管得太多太紧,银行也可以按照市场化的商业标准来支持民间办学、政府也应该给予资助。

对于当前民办教育企业生存环境,信力建坦言,当前教育领域的准入标准太多、门槛过高,民办教育难以介入。比如,很多省市搞示范高中,民办教育只能靠边站,大学也有类似的现象。同时,民办教育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关卡很多,如要符合若干办学标准、各项年审、评估评级,好比现在小学考试改测试了,貌似要求低了,却处处有标准,整齐划一。

近年来,全国出现了不少民办教育机构,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信力建表示,当前民办教育机构所面临的生存压力都不小,“一方面国家现有的教育政策和法规是倾向于公办教育,民办教育均是自负盈亏,要承担所有教职工的‘五金’等支出,另一方面民办教育机构的一些具体办学内容和行为又常常受到国家法规的限制。”

以幼儿教育为例,目前广州8所机关幼儿园每年动辄获得几千万近亿的财政补贴,而民办教育机构所能获得补贴却是杯水车薪。信力建建议,“如果国家未来对于教育的财政支持,能够以市为单位量化到每个学生的身上,相信对于学生个体,民办教育都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举措”。

同样,面对近年来的民办大学,信力建认为,国内的民办学校就必须符合多项条件限制,一边是办学条件标准过多,一边是银行贷款门槛高,同时还要上缴名目繁多的税费,这无形中制造高准入门槛,这对教育来说是极其不幸的事情。

当年,我国大学教育启动了一轮“全面扩招”计划,大学入学率由原来不到15%达到现在近30%。对此,信力建指出,“大学教育还有发展空间。但现在不是按大的标准建设,而应立足于专科学校发展,更专业化、技术化、市场化,更贴近老百姓,贴近生产。”

视角

地方政府不该溺爱纳税大户

■ 陈青松

近年来,国内环境污染事件、食品安全事件不时曝出。然而,每每发生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事件等关乎公众健康的公共性事件发生后,涉事企业在备受公众和舆论指责的同时,当地政府主管部门都未能幸免。

近日被热议的山东潍坊环境污染事件,由于潍坊环保部门给相关企业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做好应对媒体的接待准备再次被舆论关注。环保部门本是公共生态环境的保护者,而非一些污染企业的保护伞。当地政府这样做,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存在暧昧的利益关系,甚或有关爱情结。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事件,涉事企业几乎都是在地区甚至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在当地都是支柱企业、纳税大户:如四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国内前三大乳企无一幸免。还有“瘦肉精”事件,涉事企业双汇是全国知名企业,是地方的纳税大户和支柱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不言而喻。

在政府相关部门被指责监管不足甚至缺失的背后,是地方主政者对待强势企业的“呵护”态度。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生态中,政企关系仍然复杂而纠结。尤其是当经济增速开始下滑,“保增长”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更多是看到支柱企业的贡献,片面追求GDP。而有许多企业在为地方贡献巨额财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高消耗和高污染。每件污染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企业追求经济利益,背后实则是部分政府部门“唯GDP”在作怪。

除了政府部门对一些企业尤其是高污染企业的不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还本着发展地方经济、增加GDP的目的,想方设法“扶持”支柱企业。

近年来飞速发展又很快陷入低谷的光伏产业便是典型例子。

四年前,光伏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是部分地方政府争相引进并欲树立为经济增长支柱的重点产业,也是地方财政“保增长”的重要砝码。然而四年后,这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公开资料显示,新余乃至江西省的明星企业赛维,2007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是江西企业有史以来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企业,也是中国新能源领域最大一次IPO。新余政府为引进赛维,通过信托公司给予1.2亿元信托产品支持,省财政支持3000万以及城市经营节余的5000万资金。此外赛维还享受到了优惠电价,每年电力补贴估计达上亿元。

在地方政府高强度支持下,最初只是生产和销售硅片的赛维也开始向全产业链延伸,迅速扩张多晶硅产能。然而随着光伏行业陷入低谷以及美国低价光伏太阳能多晶硅产品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赛维爆发危机。

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产能增长,使得投资行为发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处置不当,扭曲了政企关系。再加上有些企业负责人头脑发热,在地方政策的关照下,将自己拐到不健康的政企关系之路上,不按市场经济法则办事。一旦经济形势有变,短时间根本无法应对。